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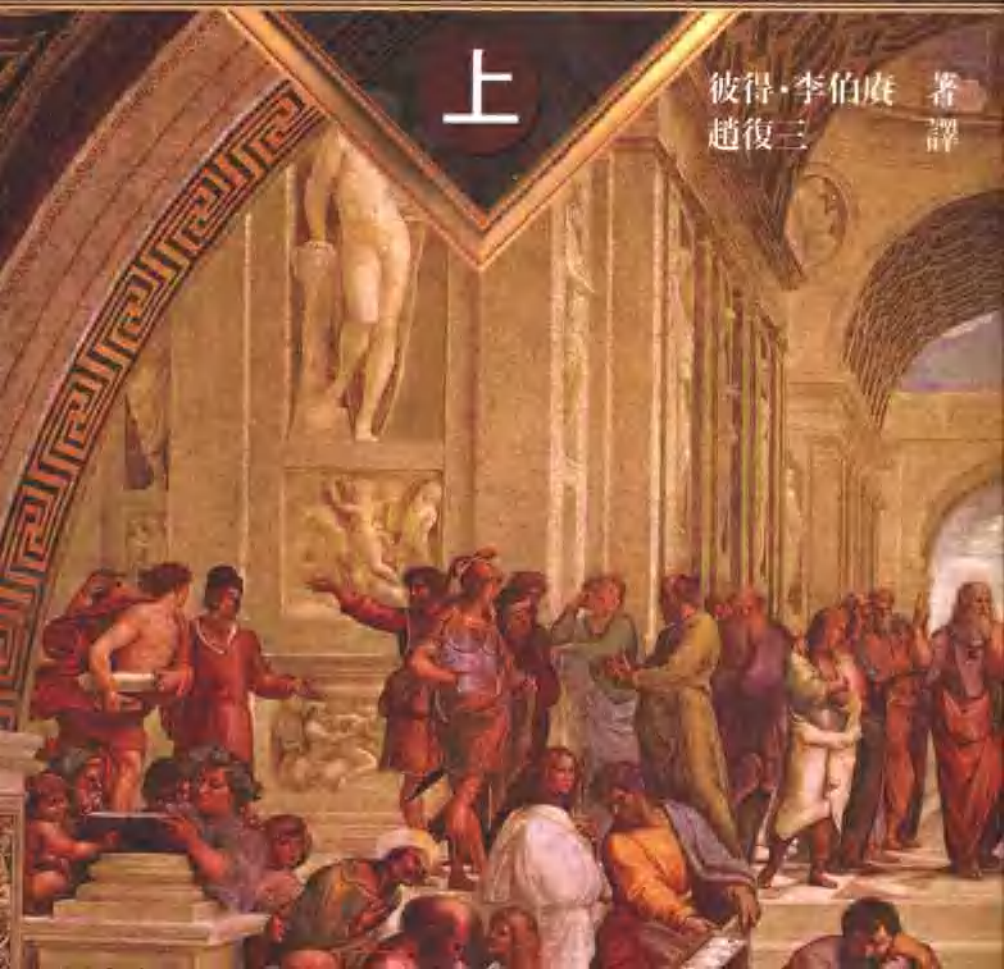
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

歐洲文化史



上

彼得·李伯庚 著
趙復三 譯



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

歐洲文化史



上

彼得·李伯賡 著

歐洲文化史（上）

作 者：彼得・李伯廣

譯 者：趙復三

責任編輯：陸艷芳、彭麗彩

封面設計：李錦興

出 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網址：<http://books.mingpao.com/>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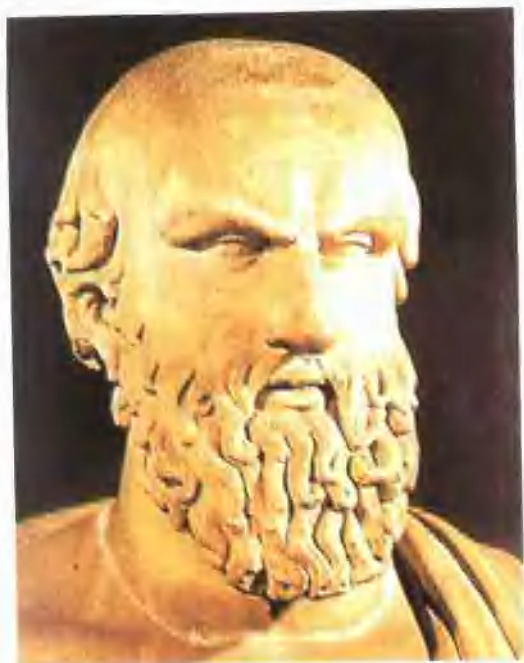
版 次：二〇〇三年三月初版

I S B N：962-973-78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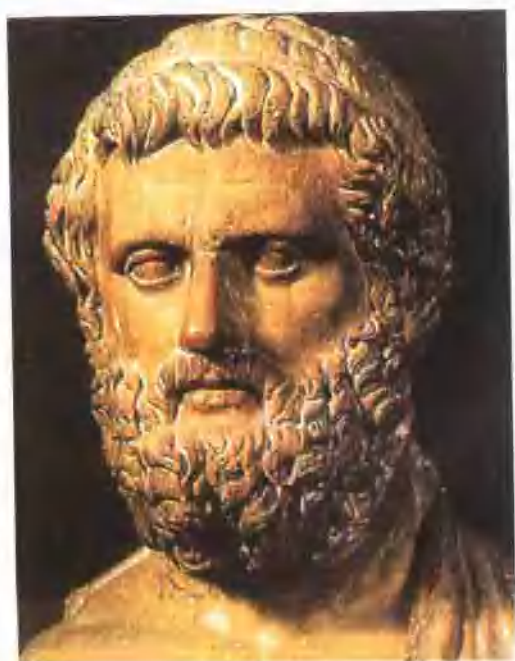
承 印：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銘源基金有限公司贊助本書部分出版經費，特此鳴謝。



埃斯庫羅斯（約公元前525年生公元前456年）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他寫過的劇本有九十部之多，但現存僅七部較完整的悲劇，其代表作是《被縛的赫羅斯忒斯》。



蘇格拉底 古代世界有兩個偉大的教育家，一是中國的孔子，另一是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一生雖沒有著作，但他的弟子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把他的言行和思想記錄並流傳後世。

AYAT 72/04



古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



希臘陶瓶 這是希臘人獨有的陶瓶，瓶上的圖案顯示陶器作坊生產的情況。這種陶瓶主要用於慶祝場合。



圖為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碗，這類希臘人獨有的碗，主要用於婚禮慶典。



希臘的大理石少女像 此為雅典衛城柱廊上的少女像，大約製於公元前500年。



希臘的勝利女神
頭上帶著橄欖樹製
成的花環。



這幅製於約公元前十年左右的浮雕，描繪了奧古斯都被花環加冕的情況。⁴



馬可·奧里略軍隊正通過羅馬的凱旋門，受到熱烈歡迎。



珠寶十字架 這個名貴的十字架，是查士丁尼二世送給羅馬天主教的禮物。



拾羊圖 圖為一牧羊人把迷途的羊尋回。這幅作品充滿了《聖經》中，上帝帶領迷途羔羊返回正道的意味。

致中國讀者

我的中國讀者們：

一個從事寫作的人總夢想他所寫的文字能有讀者，而且愈多愈好。這是一種人所共有的真情。而有的時候，這個美夢竟然得以實現到超過人所能嚮往的程度。一個荷蘭歷史學者用英文寫作的《歐洲文化史》得到一位中國同事建議，把它譯成中文，就彷彿是中國這個擁有偉大傳統文明的國家把它的大門敞開了。

中國對世界其他文化所作的貢獻，是怎樣估計也不為過的。多少世紀以來，許多中國의思想和器物，從東亞、經過海路，跨越沙漠，到達歐亞大陸的西部。歐洲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得益最多的可能就是和中國的文化聯繫。

令我高興的是，1675年，把孔子的《論語》首次以有韻腳的歐洲語言、翻譯出版介紹給歐洲大眾的，是一位荷蘭人彼得·范·霍恩（Pieter van Hoorn）。他在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駐中國清廷的使節之後，做了這項工作。彼得·范·霍恩還着重指出，孔子的思想構成中國社會的基礎，而他的思想和構成歐洲社會基礎的耶穌基督的思想是協調一致的。

現在，一位我所敬重的中國同事趙復三教授把一個荷蘭人撰寫的歐洲文化史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各界讀者。這令我想起三個多世紀前一個荷蘭人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的史實。如果這本小書能夠把歐洲和中國這兩種偉大的文化和學術傳統進一步聯結起來，可以說，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彼得·李伯慶

2001年6月

《歐洲文化史》譯序

——面對大海的斷想

從大西洋岸、西北歐的布拉班古城來到東南歐地中海的克里特島，離上次訪雅典登上奧林匹斯山，在阿克波里斯神殿的殘柱中間徘徊，已經五十五年了。只是希臘的天空和與它相輝映的地中海，仍舊那樣蔚藍；滔滔海浪仍舊永不止息地唱着歷史之歌。一部歐洲文化的四千年歷史從這裏開始，是有充分原因的。這是歐洲東南隅的海上邊界，四千年前（相當於中國夏朝），島上的希臘居民在和埃及與中東各民族的海上經濟文化交往中發展了歐洲最早的米諾阿文明，由海島傳入希臘本土。至於米諾阿文明和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及他建立的希臘帝國、公元六世紀查士丁尼和東羅馬帝國的“盛世”，一直延續到十五世紀中葉的拜占庭帝國，都早已沒落，化為歷史的陳蹟，任人憑弔。報上現在還經常出現的唯有亞歷山大皇帝的故鄉馬其頓，也只是因為那裏的民族衝突發展為戰爭，不知如何結束。面對歐洲各國的興衰，像眺望海水的漲潮和退潮，一個中國人想些什麼呢？當然人各不同，而且有不同的想法，多總比少好。重要的是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歷史道路和經驗去認真思索，是不是這樣呢？

＊

＊

＊

＊

不久前，詩人懷宗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人到海外，不論多久，怎麼心裏總也放不下中國？當時我回答不出，就像問我為什麼愛母親我回答不出一樣。於是，這也成了我的問題，時刻糾纏在腦際，要求回答。

對現代中國人來說，愛國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德國作家托瑪斯·曼因被納粹迫害而流亡海外。有人問他：“你想念德國嗎？”他回答：“我在哪裏，德國就在哪裏。”中國人大概不會這樣回答，想到中國時，總和那片土地的山川平原，那裏千千萬萬和自己一樣的人聯在一起；或許就因為中國幅員

面積太大，中華民族人口太多，因而產生一種“萬有引力”？但又問自己：愛“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嗎？愛“四人幫”掌權時的中國嗎？自己想一下，當時，不管自己怎麼遭殃，仍然是愛中國的，因此而痛恨假革命之名，實施法西斯專政，痛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從這樣來想，國家和掌權者，在根本上就是兩回事了。國家是由億萬人民組成的，掌權者則一個又一個朝代地更迭。

再細想一下，中國人愛秦始皇嗎？秦始皇為奠定大一統的中國不是作出很大貢獻嗎？如果說，歷史自有公論，那麼，儘管秦始皇推行郡縣制，實施車同軌、書同文，統一了中國；又修築了萬里長城，捍衛了國土，抵禦了外敵，老百姓仍然不愛他。無論怎樣為秦始皇翻案，在老百姓心目中，他始終只是暴政的代表。為什麼？因為他殘害人民。這就是歷史的公論，歷史公論的依據不是只從表面去看個人的權位作為，而是從根本上看他對人民大眾的態度和表現。

1822年，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從哲學角度看世界歷史》（《歷史哲學》是後來英譯本給它另起的書名）時，指出在有悠久文明的古代各民族中，中國人的特點是具有一種深刻的歷史意識。可以就黑格爾的觀察接下去說，歷史意識並不僅僅是尊重歷史，把歷史事實認真紀錄下來，而是樹立一個衡量判斷歷史的標準。從歷代統治集團來說，這種深刻的歷史意識表現為對自身統治意志的“深刻意識”：一切，包括修史，都要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服務。而在人民大眾中間，則另有一種對歷史的深刻意識，表現為另一種衡量判斷歷史的標準，一切事情要看它對人民大眾的態度。這是兩千多年中國人民思想的傳統，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愛國不是只眷戀桂林山水、德州燒雞……。從根本說是愛中國的廣大人民，愛中國文化的精髓。這是中國人無論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放不下的。在歷史中真正能夠長存的，乃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實踐所結晶成的文化。

國家、朝代有它的興衰，文化也同樣有它的興衰。西方人讀西方文化史，總要從埃及古代文化說起。但是埃及帝國的古代文化早已沒落了，皇帝和美女都早已成為骷髏，化為塵土，只剩下少數考古學家、數學家還在研究，當初建造金字塔時，天文學和數學上的

測算何以那樣精確。巴比倫帝國的古代文化也早已沒落了，亞述帝國的文化也早已沒落了。文化悠久、民族強大，並不能保證“源遠”就必定“流長”。阿諾德·湯因比研究了人類有史以來有影響的二十一種文化，到今天在世界範圍內還繼續發揮廣泛影響的只有五種，其他文化都已沒落了。湯因比以西歐的基督教文化圈、東歐的東正教文化圈、從北非到東南亞的伊斯蘭文化圈、南亞印度文化圈和東亞文化圈來概括今日世界文化的不同類型，是否最科學合理，也許還有可以斟酌的餘地（克立佛·吉爾茨在《對伊斯蘭的觀察》一書中便指出了摩洛哥和印尼的伊斯蘭實踐多麼不同）；重要的一點是指出了文化有興也有衰。

文化的興衰以什麼來衡量？主要看兩方面：首先是看它對這個文化圈內部人民大眾發揮的凝聚力和推動社會前進的作用；二是看它對世界人類社會前進作出的貢獻。離開這兩條來談文化興衰（例如說文化市場如何繁榮，書籍報刊有多少品種、多少發行數目等），恐未免表面化。如果以這兩條來衡量中國文化，怎樣合乎實際地評估今日中國的文化狀況呢？

文化怎樣就“興”？怎樣就“衰”？歐洲人對自己的文化總是上溯到希臘羅馬，現在所稱謂的希臘羅馬古典思想，實際是希臘人吸收了埃及和中亞各民族文化而初步形成，羅馬人興起後，除吸收希臘文化外，又吸收歐洲北部凱爾特人、日爾曼各民族文化，以及北非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此後，八到十五世紀間，歐洲人又吸收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間接還吸收了東亞文化），經長期與其他文化交流而發展成人們觀念中的所謂“歐洲文化”。中國由於所處地理環境，在公元前，只是在東亞大陸的範圍內融合各民族，發展自己的文化，比較自足。而後從北方陸上的絲綢之路和南方海上的絲綢之路吸收了主要是南亞的佛教文化；當時大眾思想是自由的，國家政策是開放的。因之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漢唐盛世”。無論西方或東方的長期歷史經驗都表明，任何民族，愈是思想上謙遜、政策上開放，能吸收不同文化，自身的文化就愈興旺；如果反過來，思想上自大，或政策上閉關鎖國，排斥外來文化，自

身的文化就萎縮。具有深厚歷史意識的中國人，是否認真從世界和中國的歷史經驗中學習了呢？抑或沉醉在“歷史文化悠久”之中，強調國情獨特而排斥其他民族的歷史經驗，或是認為東方文化必將統合西方文化，以此為世界文化發展的必然前途呢？同樣是在東亞的中國和日本，試以兩國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比較一下。日本從幕府時期長期閉關鎖國之後，1854年國門被美國炮艦打開，自明治維新起，吸收外來文化是全方位的、認真的，因此，它的現代化進程就比較快。中國在乾隆皇帝答覆英皇喬治三世的信裏，已經表現出一種文化思想上的自大。1840年國門被英國炮艦轟開之後，統治者在政治、經濟上不能再閉關鎖國，文化思想上卻仍然是抱殘守缺的。不知與中國的漫長歷史有無關係，甚至五四以後的中國文化界，對於從事介紹外國文化的學術翻譯工作似乎也不如日本學術界翻譯外國學術著作那樣熱心積極並且嚴肅認真。一直到今天，只見科技興國的重要性，而對於外國各族的歷史文化，則強調不同多，認真學習少，不知是否還有一點歷史的幽魂在作怪？

十九世紀的中國是西方列強侵略、掠奪的俎上肉。二十世紀裏，被嘲笑為“東亞病夫”的億萬中國人，經過一個世紀艱苦卓絕的努力，終於站立起來了。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走入世界的世紀。但是，中國人肩上也揹負着“悠久文化”中的包袱，又揹負了二十世紀歷史的包袱，能以輕鬆的步伐走進世界嗎？世界人民對中國的古典文化是敬佩的，今日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從物質文化說，有進步的地方也是有目共睹的，至於精神文化方面就很難說了。到中國經商、旅遊、進行文化交流的人們，並不都是來自西方國家，有的來自東亞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有許多海外華人，也並不都是戴着“反華”的政治眼鏡，許多是對中國文化抱着敬仰，對中國抱着友好的感情而來的。他們的足跡踏遍全中國，總覺得中國的各種宣傳和他們切身的經歷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今日中國大眾追求的是什麼？大眾關心國家大事的程度如何？大眾自由表達思想的程度如何？政治道德、商業道德、社會公共道德的水平如何？政府官員是否廉潔奉

公、一心為人民服務？下一代年輕人的精神面貌如何？知識界既然受到更多的教育，是否因此對社會負起更大的責任，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今天出國的形形色色的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如何？經過一百年，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以“三個代表”指引大眾的國家領導層的精神面貌，所有這一切如果和四十年代全民抗戰時比較，和二十年代五四運動時比較，和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前夕比較，有了哪些進步？這是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化的實際體現。如果“發展生產力是衡量一切工作的唯一標準”這個理論方針，還繼續推行一百年，中國的國家前景，在精神面貌方面將是怎樣？這一切是否值得有頭腦的中國人深思一下呢？其他民族的發展經驗是怎樣的？有沒有值得借鑒的地方，還是中國國情特殊、文化優秀，不必也不能向其他民族學習了呢？這些是使譯者困擾、在思想和生活的困擾中翻譯這本《歐洲文化史》的原因。

* * * *

過去在美國、加拿大和其他地方邊教書邊遊學，一直留意，希望找到一本既能反映全貌，又擺脫民族偏見，又能反映最新學術研究成果的優秀的歐洲文化史，可以介紹給國內的讀書界。可惜孤陋寡聞，始終沒有找到一本滿意的書。其中，有自己的一份偏見，總覺得正如講中國文化，首先要看中國學術界研究的成果，外國學者來講，總不免有隔靴搔癢的地方。講歐洲文化，首先還是要讀歐洲學者的著作，頭腦的知識和內心的觸動是兩回事：有切身體驗和沒有切身體驗是很不同的。但另一方面，歐洲學者有時也有本國的局限性，需要仔細比較篩選。從北美轉到西歐，向有關學者請教，終於找到了荷蘭天主教尼梅根大學文化史教授彼得·李伯賡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新著《歐洲文化史》。荷蘭在今日歐洲不是大國，但是在近代歐洲文化史上卻有其自由思想的傳統。十五六世紀間，北部歐洲的人文主義思潮中，鹿特丹的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通常以鹿特丹的伊拉斯謨著稱)起了重要作用。在歷史學方面，十九世紀末的赫伊津哈是研究歐洲中世紀後期歷史的重鎮。梵高是以他的繪畫來進行文化批判的